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範圍

《三言》乃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恆言》的合稱，為馮夢龍所編著，在明末盛極一時，流傳至今，已成為研究中國話本小說的重要資料。它的編纂，標示了話本小說重要的進程，不僅大幅拓展小說的題材內涵，經由文人的再創造，又啟發了後來的擬話本小說的創造，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。鑑於其文學價值，從鄭振鐸、容肇祖、馬隅卿、孫楷第等人以來，便開始整理原著及收集考證有關馮夢龍、《三言》的材料。¹近幾十年，因為《三言》的原刻本從日本的公私文庫中攝得，民國四十七年由世界書局陸續出版，臺灣也開始掀起研究《三言》的熱潮²。評論者分別從作者與版本流傳、文化解讀、與其他作品的比較及影響、題材研究、人物形象分析、作品形式特徵等方面切入。而大陸學者自八十年代以來對《三言》的研究，也遍及作者生平、思想、作品評價、人物形象、作品藝術性等各範疇，近幾十年的研究，並不脫大致的方向。另外，由於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在國外的傳播甚廣，還出現了大量擬作。日本學者除考察因擬作而形成的「讀本小說」，以探測《三言》對日本文學的影響之外，也對其內容題材和文體特徵進行研究。³如佐藤晴彥探究創作的語言特徵，他作有《醒世恆言》中的馮夢龍創作——來自語言特徵的研究⁴。而小野四平也有《中國近代白話短篇小說研究》，是以馮夢龍及《三言》為中心，討論其中的公案、婚戀、宗教題材等。⁵西方學

¹ 白豔玲：《三言》研究十年回顧（1990—1999），《內蒙古電大學刊》4期（2001年），頁74。

² 見徐文助引言。明馮夢龍編撰，徐文助校注，繆天華校閱：《喻世明言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8年）。

³ 吳光正、溫孟孚：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在國外的傳播、接受、研究狀況，《文史知識》7期（2002年），頁114。

⁴ 佐藤晴彥作，王欣譯：《醒世恆言》中的馮夢龍創作——來自語言特徵的研究，《河北師院學報》（社會科學）2期（1992年）。

⁵ 小野四平著，施小煒、邵毅平等譯：《中國近代白話短篇小說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者則較重考證，如吳曉鈴、西里爾 伯奇（Cyril Brich）、韓南（Patrick Hanan）等人，對於《三言》的本事來源、作者歸屬，皆有顯著的研究成果。以韓南為例，他的《中國短篇小說》，精闢地分析了《三言》的故事繫年、作者歸屬與成書過程，也利用文體的概念，探究小說的敘事技巧。⁶

以上學者的研究成果，大體從作者、故事來源、內容題材等相關論題來討論，其研究方法多以分析作品主題意義、作品背景的探討為主，隨著時代的遞移，研究角度略有不同，學者開始關注到文化解讀的方式，在研究中觸及精神史的爬梳以及扮裝的深層意涵。一方面是對前人的研究繼續挖掘，另一方面也利用新方法，從另一視察的角度來看待作品。基於《三言》適俗導愚的創作理念，文本不僅是創作者的心理世界圖像，也是貼近生活，與讀者思想緊密相連的文學創造。因此從文本去掌握內涵思想，並將其思想觀念納入整個歷史情境、文化脈絡下考量，則可以探測處於特定時空下，人的普遍意識。本論文擬以《三言》為討論的文本，所選定的版本為三民書局出版的明天許齋本《喻世明言》、明金陵兼善堂本《警世通言》、明葉敬池刊本《醒世恆言》。⁷除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進行討論，也嘗試從越界（transgression）的觀點來解讀。之所以由此切入，乃因筆者在閱讀《三言》時，發現文本中對界限的思考，關係著人們如何看待常與非常，以及如何關懷自我與他者的問題。因此，從越界的觀點出發，探討文本中性別的界限、性禁忌的形塑，以及理性與非理性的界限，在《三言》的研究上，將是一個別具意義的切入點。

1997年）。

⁶ Patrick D.Hanan 著，王青平、曾虹譯：《中國短篇小說》（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97年）。

⁷徐文助校注，繆天華校閱：《喻世明言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8年）。

徐文助校訂，繆天華校閱：《警世通言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83年）。

廖吉郎校訂，繆天華校閱：《醒世恆言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5年）。

西方學界對越界的探索，可從巴汰易（Georges Bataille, 1897-1967）布朗修（Maurice Blanchot, 1907-2003）乃至於傅柯（Michel Foucault, 1926-1984）追溯起，他們認為越界哲學是由動搖康德（Immanuel Kant, 1724-1804）的哲學為開端，因為康德哲學所反覆探究的是起源，而為他們所推崇的尼采（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, 1844-1900），追尋起源的方式卻是不否定性、不實證性的思考，以致於能跨越人類學與辯證法的劃限。⁸在思想發展的過程中，巴汰易所提出的越界概念，企圖顛覆封閉的論述系統，並且質疑笛卡兒乃至黑格爾的理性主體，逾越在此，成為一種脫離完整的、原有的意義架構路徑。⁹到了布朗修，則將巴汰易曾討論過的內在經驗（Inner Experience）加以深化，並且提出極限經驗（the limit-experience），這種極限經驗產生於越界的行動，是人決定強烈質疑自己遭遇的反應。如越界發生於書寫，便是一種極限經驗的書寫，能改寫理性、權力宰制下的封閉侷限，達到意義的無窮盡與豐富性。¹⁰由上述巴汰易與布朗修兩人對越界的關注，則可以得知越界乃是對無法企及境界的爭取。

後來越界更廣泛地被運用在，對情色語言、瘋狂越界的哲學辯證，以及探究性別越界的可能性。傅柯的研究指出，精神病院的設立是一種對病人的分類體系，那些瘋癲者以知識的名義被劃定一個空間隔離禁閉起來。在這裡，瘋癲被理性所監控，理性與非理性的界限也被嚴格劃分，而其中的非理性部分，便是傅柯所關注的。¹¹因為只有在非理性之中，主體才有可能因逾越而體驗到衝動和放縱的快感，並藉由這些內在的體驗，瞭解自身真正的存在。另一方面，人們從語言、

⁸柯朝欽：《歷史分析中的越界可能性》（臺中：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，1995年），頁12。

⁹Georges Bataille, *Essays : Visions of excess: selected writings, 1927-1939*. Minneapolis 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1985, p.116-129.

¹⁰Maurice Blanchot, *Entretien infin :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*. Minneapolis, Minn. 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1993, p.203.

¹¹汪民安：《福科的界線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15。

法律認識到的性，也在禁忌的規訓中，標示著人與人之間的界限。傅柯將這些理性與非理性、知識與權力等等議題，置放於歷史背景之中去考察，而從這些社會現象思索起的哲學問題，便獲得了它的根據及被闡釋的有效性。他進一步指出界限的劃分，在於釐清、阻隔及標示差異，而越界的行動，不是意味著否定界限，而是去確認界限的存在，開闢出另一個無界限性（limitlessness）的地域。越界所開創出的無界限性地域，使書寫的極限經驗以及閱讀的內在經驗，獲得實踐的可能。逾越的同時，主體已變換了新的思考方式，逾越與界限的關係也不是二元對立的。¹²甚至可以說，越界就是一種「界外思想」（outside thinking），所關注的是相對於主體之外的邊緣區域。¹³因此，本論文將從巴汰易、布朗修等人對界限的思考，以及極限經驗的探測，作為分析文本的切入點。

越界思想所提供的觀察向度，即文本中所隱含的，人類對秩序化世界的分類思考，以及在逾越過程中人們除卻束縛的內在體驗。而筆者關注的便是《三言》之中，那些逾越的事件及逾越界限的邊緣化人物如何被看待。依照傅柯的看法，越界的探析是受到理性主體啟蒙的歷史影響，然而在中國的小說文本中，卻無這樣的思想背景。因此若援引這些哲學論述來看文學作品，為了更恰如其分地闡釋文本，適當的轉化與變形便是接受過程中無可避免的。¹⁴將越界思想放在中國文學作品的脈絡裡，必須考量到，邊界是如何形成的？又在中國人的思維邏輯裡，

¹²Michel Foucault, *Language, Counter-Memory, Practice: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*. New York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77, p.35-36.

¹³ 關於主體的論述，十七世紀的笛卡兒把自我的主體意識，視為一種理性的思考意識，在這裡，身體只是載體的作用，並非意識形成的來源和基礎。自笛卡兒以後，西方的主體哲學發展至康德，達到高峰。康德認為，主體意識的經驗部分，來自於主體感官印象，亦即人類所能認識的僅止於現象界，所以不可能認識到屬於本體界的「物自身」。笛卡兒和康德是以理性的角度來分析主體，把主體視為理性的意識，到了後結構主義，卻把主體看做是文化與社會的產物。在傅柯的研究裡，主體便包含了兩種意義，一是以自我知識或良知而建立起來的自我認同，一是受制或依從於他者的自我。以上對主體的討論，可見譚國根：《西方對「主體意識」的探討與論述模式的轉移》，此文出自《主體建構政治與現代中國文學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3-28。本文所討論的「主體」，乃傅柯定義下的「主體」，是被權力所塑造，也是文化與社會的產物。

¹⁴ 陳平原：《小說史：理論與實踐》（臺北：淑馨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26。

是否有純然的二元對立？¹⁵儘管首先面對的困難，便是如何從文本中的政治、社會、宗教、歷史或意識型態的層面，找出其中有多少程度被書寫出越界的思想？這樣的逾越又究竟鬆動了些什麼？是否能脫離所逾越對象的影響？但無可否認的，越界的思想還是極具啟發意義的，當評論者開始探究文本中各種越界的表演時，便可以思考創作者如何藉由書寫界限及越界，表達其社會關懷。因此，本論文將重在探究《三言》中所涉及的越界，考察明代人對界限的思考。而截至目前所見的《三言》相關研究成果，有扮裝、異類故事、空間探討等學位論文，以及西方學界的部分討論，但未有以越界觀點探索《三言》者，觀察文本在歷史脈絡中，如何以越界現象的呈現，達成其閱讀效果，故而本文將是新的詮釋路徑。在文本中，雖然創作者從人己身出發進行描述，在文本中形成性別、生死、常與非常的對立形勢，然而寫到關於這些脫逸越界者的故事時，並不是採取與之抗衡的姿態，而是企圖去反映出人與人的關係、人與世界的關係，以敘述出人的心理世界與經驗感。故此研究越界，並且把它視為一個文化現象，筆者試圖觀察的是在越界過程中，人們的行動究竟是肯定界限或模糊界限？藉此考察出人們對界限的思考。

第二節 歷來的研究成果

就研究路徑而言，學者致力於《三言》的考證，如作者、版本、寫作年代的考訂、小說故事的源流等，自一九三〇年代開始，便有容肇祖《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》、孫楷第《〈三言〉、〈二拍〉源流考》¹⁶等文章奠下基礎。後更有胡士

¹⁵ 蔡淑玲：聽，那萬流匯聚的「中界」——從克莉絲蒂娃的「宮籟」探主體的異化與論述的侷限，《中外文學》30卷8期（2002年1月），頁180。

¹⁶ 容肇祖：《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》，《嶺南學報》2卷1期（1932年3月），收入於容肇祖：《馮夢龍與三言》（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3年）。孫楷第：《〈三言〉、〈二拍〉源流考》，收於吳智和主編：《明史研究論叢》第一輯（臺北：大立出版社，1982年）。

瑩的《話本小說概論》¹⁷與譚正璧編的《三言兩拍資料》¹⁸對《三言》的歷史背景進行深入的爬梳。隨著新資料的發現，不斷地有人提出關於考證的嶄新觀點，這方面的學者有韓南（Patrick D.Hanan）、張克哲、柳存仁、胡萬川等。其中，張克哲在譚正璧、胡士瑩兩人的基礎上又續有補充，作有《三言》《二拍》本事資料拾遺¹⁹。由王秋桂所編的《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》，則收錄有《古今小說》中某些故事的作者問題、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撰述考，從中可見韓南兼治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，除了引進敘述者的概念外，他也評析《三言》的作者問題與故事來源，認為經由對小說的體裁、改編過程的討論，可以得知故事在不同的文學類型中，產生不等程度的審美效果。²⁰而胡萬川的《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》，則論析了《三言》的版本與流傳、作者問題，以及如何從馮夢龍的其他創作，觀看作者其人、其社籍。²¹以上學者選擇考證的路徑，是從對作家作品的詳盡追溯，來把握小說的歷史地位及脈絡，對小說的研究具有卓越貢獻。

而考證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路徑，便是對內容題材的探究。自一九五〇年始，大陸學者以解放思想為主題，往往在論述中涉及作品所反映出的市民文學問題、反封建思想、知識份子、女性形象及婚戀觀等等。如汪玢玲等作有《三言》的市民文學特色（《東北師大學報》1989年4期），以及張振鈞、毛德富所著的《禁錮與超越——從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看中國市民心態》，便是從《三言》中的市民化傾向，討論市民意識對作品藝術性的影響。²²在婦女觀方面，則肯定女性對婚

¹⁷胡士瑩：《話本小說概論》（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77年）。

¹⁸譚正璧編：《三言兩拍資料》（上）（下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）。

¹⁹張克哲：《三言》《二拍》本事資料拾遺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3期（1997年）。

²⁰王秋桂編：《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79年）。

²¹胡萬川：《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4年）。

²²張振鈞、毛德富：《禁錮與超越——從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看中國市民心態》（北京：新華書店，1988年）。

姻的自主，並讚頌其聰明才智。如王引萍 試論《三言》中的婦女主題（《西北第二民族學院總報》1991年2期）、劉軍華的 馮夢龍的「情教觀」與《三言》中的女性形象（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》1998年1期）、在閻璋的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主要男性形象管窺（《明清小說研究》1997年3期）中，也認為《三言》的男性形象，與以往小說中的男性審美價值迥然有異，市井男子的腐化沒落，正襯托出女性的進步與解放。這種研究路徑深受意識型態制約，所重視的是小說內容的革命性與社會性，如此便不免忽視作品的文本分析及評價，而自限於意識型態在文學藝術創作中的作用。

臺灣學者對《三言》的探究，多從觀察當時的人情世態入手，如李漢祚《三言研究》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64年）、王淑均《三言主題研究》（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79年）、陳妙如《古今小說研究》（私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81年）、咸恩仙《三言愛情故事研究》（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82年）、崔桓《三言題材研究》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84年）、郭靜薇《三言獄訟故事研究》（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0年）、柯瓊瑜《三言教化功能研究》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4年）、蔡蕙如《三言中的婚姻與戀愛》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4年）、霍建國《三言公案小說中的罪與法》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5年）、劉素里《三言二拍一型的貞節觀研究》（私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5年）、王吟芳《三言發跡變泰題材之研究》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5年）、賴文華《三言二拍中的遊民探析》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5年）、陳國香《根據三言二拍一型見證傳統的女性生活》（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8年）、楊凱雯《三言幽媾故事研究》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8年）、金明求《三

言的死亡故事探討》(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, 1999年) 陳秀珍《三言兩拍情色探究》(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, 1999年) 馮翠珍《三言二拍一型之戒淫故事研究》(私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, 2000年) 金明求《虛實空間的移轉與流動——宋元話本小說的空間探討》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, 2002年)等。這些論文將文本做分類的主題式探討, 並分別就其情節架構、思想意識、表現技巧等, 進一步理解和描述小說的深層內涵。這種類型式批評, 是藉由對類型歸屬的深入挖掘, 進而掌握其內蘊的批評手法。批評家們認為分類後的小說文本, 必然有一套基本的法則, 作為作家傳達思想意識的工具, 有的評論者更意圖把文學文本視為生活的再現, 而作品的價值便在於其真實性的反映。例如在《三言幽媾故事研究》中, 批評的主題集中於所有不欲人知的情事、性事。論者認為這些不當的關係, 反映出對婚姻制度及貞節觀的反動。在《三言兩拍情色探究》中, 論者從文本中情色的題材、被刪去的性描寫、情色試煉、反映出時代的風氣等方面, 探索其中的情色世界, 並歸結出小說的教化功能是處理情色事件的指導模式。至於人物形象的分析, 則重在釐析其背後的思維方式及人物塑像的時代背景。如: 柳之青《三言人物研究》、林麗美《三言二拍中的女性研究》、劉灝《三言二拍一型中的婦女形象研究》等。

類型分析, 雖然能在小說創作規則及主題意識方面, 具有明確的研究成果, 然而實際的創作卻是複雜多變的, 研究中必須兼顧作者以何種方式敘述, 與所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敘述對象, 因此在將《三言》做主題式的故事分類時, 也就得同時考量文本的共時性分析與歷時性研究。用主題的概念來分析文本, 並且主張文本展示著一種抽象的意念, 是現今研究的普遍趨向, 而一部作品的主題, 往往是在多個讀者的不同層次閱讀中被獲得。這種主題學式(thematics or thematology)的研究, 起初源於十九世紀德國學者的民俗學研究, 側重在探索相同的民間傳說

和神話故事，在不同的時空與作家手中有何相通性，²³後來則成為比較文學中的一門，並且集中在對個別的主題、母題（motif），做追源溯流的探究，以分析不同時代的作家，如何以相同的主題抒發情感並反映時代。²⁴與主題學不同的是，一般的主題研究，著重在個別主題的呈現，於是便可能忽略這些不斷孳乳的故事，各有其延展的根由。因此，藉由主題學研究的啟發，可結合共時性分析與歷時性研究，²⁵也就是說，若將《三言》中故事源流的考證、時代與作者，以及文本分析聯繫起來看，便能提出更切合文本的主題探究。如此也能避免僅止於進行瑣碎的歷史考證，或主觀地論斷作者的意向，而忽略文本的文學性以及內部世界所涵攝的創作理念與思想內涵。

蔡祝青在《三言二拍中男女變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》²⁶中，運用女性主義的「性別政治」（Sexual Politics）²⁷以及符號學理論，分析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中的男女變裝。論者以為男女變裝，是為掩飾生理性別的事實，以達到其預期的溝通目的。在此，服飾成為一種文化符號，指涉出社會的性別權力結構。而小說中的男女在變裝之後，依舊脫離不了性別意識的宰制，男扮女，可自由地行姦淫之事；女扮男，一方面可獲得追求男性價值的機會，一方面卻仍在生理性別的規範下，守貞節、守忠孝。於是小說雖有越界之實，卻只是文化結構的再現。此文援引西

²³ 陳鵬翔：《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》，《中外文學》12卷2期（1983年7月），頁74。

²⁴ 關於主題學的討論，可見 Demetz, Peter, 1922 ed. Greene, Thomas M., ed. Nelson, Lowry, 1926 ed. Wellek, Rene, *The Disciplines of criticism: essays in literary theory, interpretation, and history*. 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68.

²⁵ 主題學的觀點在國內的發展，最早可追溯自鄭樵。如：「稗官之流，其理只在唇舌間，而其事亦有記載。虞舜之父、杞梁之妻，於經傳所言者數十言耳，彼則演成萬千言。顧彼亦豈欲為此誣罔之事乎？正為彼之意向如此，不得不如此，不說無以暢其胸中也。」鄭樵認為這些流傳於里耳巷弄的故事，皆為作家的意向如此，他們將原有的故事擴為萬千言，利用它來「暢其胸中」，因此可以窺探其時代特徵。引自鄭樵：《通志》（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63年），卷四十九 樂略一，頁631。

²⁶ 蔡祝青：《三言二拍中男女變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》，《第六屆南區五校中國文學系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南：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00年）。

²⁷ 「這個社會所有通向權力（包括警察這一強制性的權力）的途徑，全都掌握在男人手裡。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。」見 Kate Millett 著，鍾良明譯：《性的政治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39。

方評論界的方法來探索《三言》，其文學研究轉向作品自身，藉以窺探文本中所展現的性別與文化意義。王鴻泰在《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》²⁸中，則認為思想史與社會史研究各有偏狹之處，於是採取精神史的研究向度，希望藉由文化批評的方式，探究思想觀念與社會變動的互動關係。也就是說，他力圖掌握明末清初《三言》《二拍》輻射出的精神構造，以明其當時歷史的推移。而其考察的結果，認為小說中所呈現的明末思想，雖開啟了新的心靈世界，但是受到現實層面的限制，以及「理在欲中」和緣報觀的交互作用，始終沒有建構出另一個社會秩序。以上專文以新的理論框架，探索文本中的真理，其不同視角的批評，雖然可以為學術研究注入活力，並且進一步使文本的分析探究更趨於完整，然必須留意的是，其中自有侷限性。例如西方文學批評有其本身發展的源流脈絡，選擇其中一種觀點來闡述，難免忽略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而流於武斷。另外一方面，以小說中所反映的思想觀念來蠡測時代心理，其預設的前提，便是小說是社會意識的投影，如此一來，表達技巧、文類成規、接受習慣等就可能被簡化。²⁹

從上述對《三言》研究成果的探討，學者分別就文本中的故事作有系統的分類與精讀，他們或從考證路徑為作品作外緣性探究，或以文化解讀、比較研究、主題研究等探測文本的內部世界。在其研究基礎上，筆者以為《三言》的研究，仍有發展的空間，因此提出越界的觀察向度，以進一步揭露文本的文學價值。

關於越界的主題，國內的專文如柯朝欽在《歷史分析中的越界可能性》³⁰中，探討在啟蒙的影響下，傅柯從早期到晚期對越界所採取的不同看法。他認為傅柯

²⁸ 「精神史：可以更廣義地在某一特定的時代裡，儘可能綜合地掌握這時代中政治、社會、文學藝術等各領域內所表現的思維，以求其相互關係或其與社會、政治狀況的關聯，並探求其歷史的推移。」見王鴻泰：《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，1994年），頁12-13。

²⁹ 鄭樹森：《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》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2卷1期（1992年3月），頁19。

³⁰ 同註8。

將越界的可能性、對界限的探問置放於歷史的分析之中，替代去尋求理性的本質。藉由歷史性的分析，對越界思想發展的脈絡可以有整體的瞭解。在文本分析上，筆者以為必須追問的，不僅是從一個邊緣異質的領域，去探索越界所達致的局面，或者以一種新的態度去自我創造，還需去探知越界的目的是什麼？如何越界？越界所造成的審美效果等等問題。從傅柯、巴汰易、布朗修等人對情色越界、瘋狂越界的關注，可知越界思想提供了一種觀察向度，而小說裡的越界，便標示了新的閱讀策略的可能。在張小虹的《性別越界》³¹中，她從越界的思考角度出發，探析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如何以扮裝或變性的「男越女界」與「女越男界」，鬆動二元對立的僵化思考，並轉化「對立政治」(politics of opposition) 為「差異政治」(politics of difference)。張小虹提出邊界所產生的焦慮與困惑，實夾雜著可能的愉悅快感，故在矛盾的背後，可以去思考越界本身究竟是模糊了或強化了疆界的存在？此書以女性主義理論為框架，再輔以解構主義、精神分析、後殖民論述與同性戀研究，作者深入淺出地分析影像美學、劇場與西方文學文本，性別的曖昧、流動性，不斷地被她強調，以標示性別本質的不可定義性。越界在此處，成為女性主義理論顛覆體制的策略之一，雖有侷限，但卻能以其不可知的潛力，開啟逾越性別、模糊認同的可能。

王志弘在《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》³²一書中，展開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結合的性別化流動之社會分析，主要在探討流動與性別兩個概念與現象。他認為移動能力的性別差異鞏固了性別權力關係，因此有賴女性外出求學、旅行或就業等移動能力的提升，來鬆動和變換性別權力關係。另外他援引「扮裝」的概念，提出流動本身便是一種跨越和劃限的表意實踐，在扮裝過程中又標示出性別符碼，故此可以說是一種性別再現的文化政治。而移動能力與性別權力關係，則牽

³¹ 張小虹：《性別越界》（臺北：聯合文學出版社，1995年）。

³² 王志弘：《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》（臺北：田園城市文化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
涉到主體與認同的問題，行動主體建構出屬於自身流動之認同政治。王志弘採取社會觀點的分析，認為跨越界限未必能顛覆既有的社會分類秩序，越界現象所產生的模糊不定，既是對原有秩序的惘惘威脅，被擾亂又建立的秩序，也預示了再被跨越的可能性。如此一來，他所謂的性別化流動、扮裝等等，便都具有強化疆界與逾越的雙重性。

從上述研究可以得知，越界在文本的應用、批評，多集中在空間、性別等議題上，而且深受西方哲學發展脈絡的影響，因此，在轉化越界的思想以評析《三言》的同時，本論文企圖能從文化、歷史、理論的各種批評向度，尋求更好的闡釋文本。

第三節 研究目的

筆者以《三言》為研究對象，即希望能從與文本的對話中發現人們對界限的思考，及如何看待常與非常，關懷自我與他者等問題，以藉此觀察出人的心理世界與真實的經驗感。從越界的觀點，筆者擬分為性別越界、情色越界、身體越界三個向度，來考察《三言》所呈現的文化現象。而之所以作此三向度的思考，乃著眼於《三言》中的兩性關係，未能被學者以越界的角度探索其中涉及的複雜面向，故分為性別越界與情色越界探討之。在性別越界的範疇裡，處理性別的界限，在情色越界的範疇裡，則處理性禁忌的問題。除此之外，牽涉生命型態轉化的故事，列在身體越界的範疇。這三個向度，彼此之間互有膠葛之處，身體越界所探討的是身體的變異，在大部分的故事裡，又內蘊了繁複的性別問題。另外，人物被置處在文本的象徵性空間，其中所發生的情色事件，皆來自於具有性別意義的身體之間交媾的行為。因此可以說，性別、情色、變形三個向度，皆與個體生命息息相關，越界行為的發生便是以身體為立足點，突破自己的侷限。由這些相關

論題的掌握，筆者試圖去思考越界的企圖是什麼？經過的過程及結果為何？又具有什麼象徵意義，方選擇它作為越界的途徑？逾越界限 (transgression)，在傅柯的解釋中，是一種對禁忌抵制的策略，也是對原有位置的偏離與出軌。³³他認為，越界本身首先已不再認可實證性意義的世界，而能以一種不依存任何事物的瀆神，達到不被束縛的空虛形式。³⁴在越界的過程裡，疆界的存在，召喚了跨越它的本能欲望，跨越的同時，則體會到欲望的愉悅。如此，越界成為一種掙脫原有意義結構的途徑，並且往往藉由欲望、文學等表現而顯露。在越過界限之後，人們便能以內在經驗的想像，達到以有限接近無限的可能。因此以越界為研究取徑，筆者擬觀察出明代人的心理世界與真實的經驗感，探究文本中人通過何種方式質疑權力機制，以及創作者如何藉由書寫人物的越界，呈現其社會關懷。

文學文本做為一種傳達作者意識的藝術創作，創作者以之作為表達的渠道，並在文本中納入自身的性別意識，也使得性別意識獲得一種歷史性的延續³⁵。如此，進而觀察文本，便可以獲知創作者如何在置身性別權力的架構下，操演出一個體現兩性話語的文本世界。筆者在此討論文本中的性別越界，即希冀從個體所扮演的性別角色，論及社會期待下性別關係所隱含的文化內涵。《三言》中，性別越界出現在男女扮裝的情節模式，藉由服飾裝扮，男女可以隱藏自己的生理性別，扮演異性，因此，服飾扮演著關鍵的角色。在中國的服飾文化裡，服飾往往象徵著政治意義與等級意義，也是一種性別差異的標誌。³⁶胡應麟於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，便有一段話說：「自後妃以至命婦，制度質采，咸有等差，不得踰僭，故成周特設官掌之。後世驕寵恣行，倡優後飾，以此職廢也 夫首服，男子婦人

³³ 蔡淑玲：界外的主體——傅柯的哲學練習，《哲學雜誌》15期（1996年1月），頁110。

³⁴ 同註12, P.30-31.

³⁵ 鄭元者：藝術發生的性別學思考（論綱），《性別詩學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20。

³⁶ 林麗月：衣裳與風教——晚明的服飾風尚與「服妖」議論，《新史學》10卷3期（1999年9月），頁110。

異。」³⁷為了使人服其服，統治階層便訂定冠服制度，以穩定階級身份。因此，服飾既是性別的標誌，也象徵著身份地位。經由這套服飾成規，文本中的扮裝情節模式，即是服飾意符的操演，與符號學中所談的能指(signifiant)有相似的概念。西方學界如羅蘭巴特的研究，曾把符號學應用在服飾上，建構出一個流行體系。他認為服飾體制(costume)如同結構語言學中的語言結構(langue)，而個別的穿著(habillement)便是一種言說(parole)。個人可以藉著服飾表達自我，以區分他者，但是又脫離不了社會認同的體系。³⁸因此，性別角色不同，便被期望有不同的服飾裝扮，而其扮裝逾越，則是性別、階級、情欲等多面向的糾結互動。本論文即從服飾符號討論性別越界，以探求《三言》的扮裝故事中，性別的邊界如何被鞏固以及被破壞。

情色越界的範疇，³⁹則包括《三言》裡所出現的，人與人之間幽媾的故事。幽媾主題在楊凱雯的論文中，已有詳盡的討論，指稱的是婚姻關係之外的性行為。本文則從越界切入，觀察社會倫理賦予生理性別的角色關係，在逾越之後呈現出何種文化意義？以及性意識在社會文化之中是如何被壓抑，並反映在書寫創作？關於性話語，馮夢龍在《醒世恆言》的序裡曾提到：「若夫淫譚褻語，取快一時，貽穢百世，夫先自醉也。」(頁1)沈溺性事的話語，只是取快一時，因此作者說它「貽穢百世」，將專談論性事的小說貶至末流。西方學者佛洛伊德亦曾指出，「根據一般的見識，『性』，意即指兩性的差別、快感的刺激和滿足、生殖的功能、齷齪而必須隱藏的觀念等。」⁴⁰其中一項定義，「性」是必須隱藏的觀念，便說明了人們對性所採取的壓抑及禁制。所以，不欲人知的性事，在小說

³⁷ 胡應麟：《少室山房筆叢 丹鉛新錄》卷十二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年），頁144-145。

³⁸ 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著，李維譯：《流行體系（ ）：符號學與服飾符號》（臺北：桂冠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30。

³⁹ 傅柯認為性事的越界，可以達到一個宣告「上帝已死」的世界，這是關乎無以名狀的瀆神。同註12,p.30。

⁴⁰ 佛洛伊德著，葉頌壽譯：《精神分析引論》（臺北：志文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288。

文本中處於邊陲的位置。而也因為如此，「性」所佔據的是較具有越界潛力的位置，藉由跨越性禁忌的行動，人類的某些強烈欲望才能被凸顯。那些幽媾故事在《三言》裡，雖披上了道德的外衣，用以警惕人不可耽溺於色欲，然其脫離社會規範的處境，卻蘊含了性別文化的諸多意義，故值得探索。

另外，以往的研究者在探析《三言》中越界現身的異類故事時⁴¹，多從情節模式分類歸納，並言其與社會民情的對應關係，或有從創作者的觀點評論之，認為文本的書寫便是為了滿足作者在現實生活中，無法達成的願望。本文在此基礎上繼續挖掘，並將異類故事歸在身體越界的範疇。而之所以做此歸類，是因為這些逸出的越界者，以身體的變異幻化方式，消解人與異類的界限，也表現了自志怪傳統以降的身體化傾向。⁴²不管是由身體的練成仙質，修成正果，或者從妖身幻化為人，與人相親近，他們都是透過身體的變化，達成其偏離的目的。因此，筆者將探索「常」與「異」的邊界，釐析創作者如何看待人類與異類之間的關係，並且在異類婚戀故事中，追尋其背後的文化意義與性別問題，從人與異類互相轉化的過程中，分析其延續生命的動機。

第四節 研究方法

本論文以越界的觀點作為切入點，除對《三言》做文本的細讀，以避免表達技巧、文類成規、接受習慣等有被簡化的可能之外，並且認為，以中文表達西方對越界的概念，其侷限性在於：越界在西方原有的語境裡所具備的意涵，及其所牽涉的他者概念，有語言轉述上的困難，在轉化的同時，並無法保持理論的原貌。

⁴¹ 異類是異於人的物類，包括神、仙、鬼、妖四種。顏慧琪指出：「『異類』的概念是由『他界』而起的。『他界』指的是相對於『此界』的『彼界』，亦即相對於人類所處的『現實界』」引自《六朝志怪小說異類姻緣故事研究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17。

⁴² 「淵源於怪異思維的志怪文類，特別著意於宇宙殊象，聲色飲宴的描寫，誇張身體變異、偽裝，以及婚愛生育的慾望等等，表現出極為濃厚的身體意識。」見劉苑如：《身體 性別 階級——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》（臺北：中研院文哲所，2002年），頁40。

基於西方文學批評，各有其發展的源流脈絡，選擇其中一種觀點來闡述，也難免忽略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而流於武斷。然筆者認為若在概念上引用，以其方法為借鑒，並嘗試把握中國文化中所建構的宇宙圖式，仍應具有解析文本上的有效性。

越界的觀念，所處理的是界限之間的關係，而邊界的設立，便映現出主體與異己的認識。人們為了理解世界，使經驗統一化、條理化，所以對實在世界加以分類、歸納，也區隔出各種物類與空間。⁴³在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裡，有關各種動植物的名稱與解說，可以看出中國人認識物類的原則，而語言符號所指稱的，便是一個秩序井然的世界。關於種類的相繼變換，卡西勒（Ernst Cassirer, 1874-1945）提出生命是一個連續的整體，⁴⁴石育良則認為中國文化傾向於將自然納入人心來理解，是採取天人合一的態度，因此在時間關係上，表現出生命的連續性，而生命的一體化，則體現在與空間互動的關係上。⁴⁵而李豐楙先生也曾提出「常」與「非常」的觀念，這個論點實預設了一個「正常」性的存在，並且認為「非常」可以突破「常」的生命限制，以變化的策略達到生命的提升。筆者在此除了延續這個觀點，即在人的思維世界裡，有一個常態的存在，也擬將研究架構立足在觀看創作者如何去選擇越界的對象，並涉及其逾越的動機、過程及結果。

本論文以性別越界、情色越界、身體越界三個向度，作為文本的詮釋架構。性別越界的部分，主在探討越界之後性別角色的模糊曖昧，並從服飾、性別文化的討論，開展出一個多元的閱讀空間。在《三言》中的男女扮裝故事，有幾種閱讀的方式，其一，在探究扮裝策略，鬆動二元對立的性別結構之前，必須瞭解文

⁴³ 李豐楙：《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——一個「常與非常」觀點的考察》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4期（1994年3月），頁3。

⁴⁴ 「生命沒有被劃分為類和亞類；它被看成是一個不中斷的連續整體。」見 Ernst Cassirer 著，甘陽譯：《人論——人類文化哲學導引》（臺北：桂冠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121。

⁴⁵ 石育良：《怪異世界的建構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37。

本中某些不斷孳乳的故事，是否有相同的性別意識主題？筆者擬將《三言》中故事源流的考證、時代與作者，以及文本分析聯繫起來看，以助於釐清文本所隱喻的性別權力與意識型態。其二，服飾是一種語言符號，在性別文化裡更是區別的象徵，那麼，在這場性別表演裡，意符如何被操作？當服飾做為性別差異的文化符碼時，經由扮裝所造成的性別含混，是強化了性別的權力關係，又或者是一種成功的逾越？而情色越界，則主要分析意識型態與文本實踐的關連。在中國文化的語境裡，《大學》：「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。」這段話，可以說明中國人的自我，事實上是立足在社會群體裡，自我的實踐，必須藉由社會群體來肯定。⁴⁶在這種情況下，性別的認同，只不過是一種社會角色的實現。因此中國文化傳統裡對性別的界定，是以社會倫理的性別角色作為基礎，生理性別中的男性或女性，應該具有社會上對其角色的期許及認可。而從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期許，便包含了性禁制。如黃標有防閑內外的說法：

內則曰：禮始於謹夫婦，辨內外。男不言內，女不言外 蓋男女之情，人皆有之，間有矢志潔清而猶或失身匪類者，況秉性豔冶而可保其無他乎？⁴⁷

《內則》所說：「男不言內」，指的是男性不言閨房之事。同樣地，「女不言外」，即指政治等公共事務不進女性閨房內。從中可見對兩性行為的限制，到了明代貞節風氣盛，防閑內外是為了不違禮，不犯性禁忌，男女都要謹守內外之界限。因此情色越界，是對性禁忌以及性別規範的一種破壞，文學創作則使得這種在現實中的不可逾越性，獲得實踐的可能。故本文將著力在不欲人知的性事，希冀從性

⁴⁶ 同註 13，見譚國根：《主體建構政治與現代中國文學》，頁 174。

⁴⁷ 見黃標：《庭書頻說》。收於張伯行輯、夏錫疇錄：《課子隨筆鈔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5 年），頁 151。

別的角度，觀察人物在事件內揭示何種越界的意義。

另外，在身體越界的範疇裡，則關注在人我界限如何設立。人們藉著劃分異於人的物類，安頓自身，卻發現界限不是永恆不變的。卡西勒(Ernst Cassirer, 1874-1945)曾說：

生命沒有被劃分為類和亞類；它被看成是一個不中斷的連續整體，容不得任何涇渭分明的區別。各不同領域間的界限，並不是不可逾越的柵欄，而是流動不定的。沒有什麼東西具有一種限定不變的靜止形態。⁴⁸

卡西勒在討論原始思維時，對類與類之間變化所做的註腳，正好可以為文本中變動不居的身體型態提出一個解釋。因為沒有一種限定不變的靜止狀態，所以類與類之間可以互變。在身體越界方面，這些逸出的越界者，以身體的變異幻化方式，消解人與異類的界限，並且得以超越時空，故此，身體的變形將是這個段落欲處理的問題。而身體越界中，大多牽涉到生命型態轉換的異類故事，因此必須追溯自志怪傳統以來的身體化傾向。另外，這些跨越生命限制的怪異身體，關係著認識自我和界定自我，他們在人我間的身體距離中，建立獨特的自我情境，故探察人如何看待此界與他界，也是研究取徑之一。

⁴⁸ 同註 44，頁 121。

